

## 【新論新探】

# 鄭觀應《盛世危言》的經世思想

張曉芬

**摘要：**鴉片戰爭（1840）開啟中國近代大門，內憂外患紛陳出現，封建社會日漸腐朽沒落，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中國各方面均陷入混亂、矛盾與衝突中。古今之間、新舊之間、中外之間等衝突不斷。此刻，志士崛起，豪俊輩出，紛紛提出許多救亡圖強之論，鄭觀應（1842-1922）亦是其中的佼佼者。然其最大特色是其一生從事工商業活動，是中國近代出身買辦商人而逐漸走上一條維新改革之路的思想家。「初則學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便是其對自己一生的寫照（夏東元：〈鄭觀應「富強救國」思想簡論〉）而其維新思想主要體現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此書是鄭觀應的一部倡導富強救國的重要代表作，

是晚清震撼朝野的一部巨著，抑是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部書；被當時人稱為「醫國之靈樞金匱」，對後人影響頗大，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乃至毛澤東等都從書中獲得啟迪與教益。然觀應以歷史發展的眼光對傳統「重農抑商」進行批判，提倡「振興商務」以商立國，並與西方列強進行「商戰」，

抵制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維護民族的經濟利益，且學習西方的民主政治，倡「政出議院」，主廣設學校，培育人才，習西方的科技技術與管理制度，如此，以建立其「商戰救國」與「國富民強」的經世濟民之論。本論文即以文獻詮釋探討、演繹與歸納研究法對其《盛世危言》經世思想做探究。

**關鍵詞：**鄭觀應、盛世危言、商戰救國、西學、國富民強

## 壹、前言

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近代的大門（注一），內憂外患逐次逼近；有：太平天國之亂、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入侵，乃至辛亥革命後多次內外戰爭，至日本全面侵略我國，致使中國各方面均陷入混亂、矛盾與衝突中。古今之間、新舊之間、中外之間等衝突不斷。內憂外患

直逼而來，人人均有著「國將不國」等憂慮。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就在此時產生諸多種種救亡圖存的思想與主張。鄭觀應（1842-1922），是近代史上的一位很特別且重要的人物。特別是他是一位「四民——士農工商」中最不為人重視的商人，但重要的是他以從商、買辦經驗建立一套「富國強兵」體系，影響到後來許多重要人物，如：主變法維新運動的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革命救國的孫中山（1866-1925），乃至主共產主義的毛澤東（1893-1976）等。這個影響，也促進中國近代轉型與發展，鄭觀應的思想、言論與著作，其貢獻不可謂不大。

鄭觀應，又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廣東香山（今中山）縣人。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社會改革者，也是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注二）。其出身於「買辦之鄉」（廣東）而逐漸走上維新之路的著名商人。青少年時代「目擊時艱，遂棄舉業，學西人語言文字，隱於商，日與西人遊，足跡半天下。」（注三）觀應從廣東來到上海後，則改學經商，走上一條當時為正統士大夫完全鄙棄的人生之路；後來在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1839-1928）所辦的英華書館夜校部學習英文，親身體會到「今日時勢，非曉英文，業精一藝，不足以多獲薪水。」（注四）且「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注五）其從事洋行買辦開始、進而經營太古洋行輪船公司並任經理、並在牛莊、上海等地開設商號、錢莊，並在長江各主要口岸開設商務機構、金融機構等，且投資諸多實業，如：輪船招商局、開平礦物局、上海造紙公司、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企業。亦與李鴻章（1823-1901）、郭高濤（1818-1891）、盛宣懷（1844-1916）等人為友，並助李鴻章辦招商局、電報局、紡織局、鐵路等洋務

建設。其一生可謂有將近六十五年時間從事於工商業等實踐活動（注六）。

然鄭觀應在同治元年時（1862）將自己與歐風接觸的經驗乃至對西方國家富強等理解，寫成《救時揭要》一書，後又將發表於《申報》、《中西聞見錄》等報刊的三十六篇文章寄呈給在香港辦《循環日報》的王韜就正，王韜為其付印，並定名為《易言》，於同治十年（1871）在香港出版。此一書是鄭觀應維新變法思想的早期雛形，其核心理念就是「變革」，變革清政府的舊傳統，並掌握西方的先進科技（注七）。而光緒十六年又增訂改名為《盛世危言》，此書就是在《易言》基礎上，擴寫而成五卷本，此《盛世危言》可謂是鄭觀應以一生心血撰寫的一部全面且有系統的改革社會、宣傳自強富國、維新變法的重要著作（注八）。鄭觀應的《救時揭要》、《易言》與《盛世危言》三部書，標誌著他社會改革思想的萌芽、發展與成熟的階段（注九）。尤以《盛世危言》充分體現其「富強救國」的核心思想，乃至其致力於社會改革實踐中的思想水平，此是鄭觀應思想的代表作。書中所論約有：「道器」、「學校」、「西學」、「女教」、「考試」、「議院」、「吏治」、「典禮」、「遊歷」、「公法」、「禁菸」、「傳教」、「販奴」、「交涉」、「建都」、「戶口」、「刑法」、「罰贖」、「醫道」、「善舉」、「僧道」、「稅則」、「捐納」、「鹽務」、「度支」、「商戰」、「商務」、「商船」、「保險」、「鐵路」、「修路」、「電報」、「郵政」、「驛站」、「銀行」、「鑄銀」、「開礦」、「紡織」、「技藝」、「農功」、「墾荒」、「早潦」、「治河」、「海防」、「邊防」、「江防」、「砲台」、「練將」、「練兵」、「水師」、「民團」、「火器」、「間諜」、「弭兵」等八十一類（注一〇）。幾乎涉及治國、建

國所有方針與策略。涵蓋有：政治、軍事、國防、經濟、國家建設、教育、醫療、商務、民生、製造、開採、農業、觀光、宗教、技藝等各行各業。然鄭觀應《盛世危言》的經世思想究竟是何？其經世救國的主張與作法有哪些？對當時與後來的影響如何？諸如此類問題，則是本論文所欲探究的主題。在此，以文獻原典詮釋法與綜合歸納、演繹等研究方法作探究。

## 貳、商戰救國

鄭觀應《盛世危言》中最獨特且與眾不同的經世思想就是「商戰救國」。雖說「富強救國」是其救國方略，也是其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但是「富強救國」本質是實業救國，鄭觀應不同於洋務派的根本關鍵在於，其認為要富國必先要富民，富民才是富強之本，是世界各國走上富強之路的共同點（注一一）。鄭觀應指出：「欲強國，先富國；欲富國，先富民。而富民之道，則不外以實業為總樞，歐美各國歷史昭昭可考。」（注一二）所以其認為救國之要不再是船堅炮利之強盛，而是民富國強以救國。然其為了掃除諸多思想障礙，首先，觀應批判傳統「重農抑商」觀念束縛；其二：

中國襲崇本抑末之舊說，從古無商政專書。但知利權外溢，而不究其所以外溢之故；但知西法之美，而不究西法之本原。雖日日經營商務，而商務總不能興。

又：

古之時，小民各安生業，老死不相往來，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國併兼，各圖利己，藉商以強國，藉兵以衛商。其訂盟立約，聘問往來，皆為通商而設。英之

君臣又以商務開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據緬甸、通中國，皆商人為之先導。彼不患我之練兵講武，特患我之奪其利權。凡致力於商務者，在所必爭。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安得為商務為末務哉？（鄭觀應：《盛世危言·商務二》、《盛世危言·商務三》，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六〇七、六一四）

世代不同，物換星移，今日世界強國均以經商富國，開疆拓土等壯大自身；總知西方文化的強盛，卻不深究其強盛之因。此刻，已非練兵重武為要，而是振興商務，使國富民強，方是抵制外國資本侵略的當務之急。所以關於此，觀應認為：

商以貿遷有無、平物價、濟急需、有益於民、有利於國，與士、農、工互相表裡。士無商則格致之學不宏，農無商則種植之類不廣，工無商則製造之物不能銷。是商賈具生財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綱領也。

且：

語云：「能富而後能強，能強而後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圖強，非強不能保富，富與強實相維繫也。然富出於商，商出於士、農、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國以商富國，以兵衛商，不獨以兵為戰，且以商為戰，況兵戰之時短其禍顯，商戰之時長其禍大。善於謀國者無不留心各國商務，使士、農、工、商投入所好，益我利源。惟中國不重商務，而士農工商又各自為謀，雖屢為外人所欺，尚不知富強之術。……我國欲安內攘外，亟宜練兵將、制船炮，備有形之戰以治其標；講求泰西士、農、工、商之學，裕無形之戰以固其本。（鄭觀應：《盛世危言·商務二》、《盛

世危言·商戰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六〇七、頁五九五）

在此，觀應具體表明：我國要救亡圖強，安內攘外，不畏強權的侵略，首要就是要做到「國富兵強」地步。加強國防戰備，是為有形戰略的保護；強化與深造士、農、工、商之學，則是充實與鞏固無形的國力根本。然兵強還在「國富」，欲「國富」則要以振興「商務」等建設與發展為主，方能達至「富可敵國」的目的。所謂士、農、工、商四者，商賈才是致富、利民、利國的來源，士農工等業，需靠商賈生財，則有所發展，無商則不能，所以商賈才是四民的綱領與關鍵。這也是觀應針對當時腐敗的中國，積弱不振，諸多弊病，提出的救國救民之方，以國富民強著手，從其根本救起，而非窮兵黷武為主，這理論就是鄭觀應所謂的「商戰救國」的重點。然觀應如何為之？據其《盛世危言》記載，可知：其首先建議清政府增設「商部」，所謂：「今朝廷欲振興商務，各督、撫大臣果能上體宸衷，下體商情，莫若奏請朝廷增設商部，以熟識商務。」（注一三）繼而，發展民間的工商業，反對清政府的官商政策；其云：

欲整頓商務，必先俯順商情，不強其所難而就其所易，不強以所苦而從其所樂，而後能推行盡利。凡通商口岸，內省腹地，其應興鐵路、輪船、開礦、種植、紡織、製造之處，一體准民間開設，無所禁止，或集股、或自辦，悉聽其便。全以商賈之道行之，絕不拘以官場體統。（鄭觀應：《盛世危言·商務二》、《盛世危言·商戰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六一二）

主張清政府對民間工商業的發展，應順從民意，任其自由蓬勃發展。凡是通商口岸或內陸腹地，應興建鐵路、輪船、開礦、種植

農作物、或紡織、或手工、或製造業等。接著，向外國商行爭回我國商業的主導權，所謂：

方今門戶洞開，任洋商百方壟斷。一切機器亦准其設廠舉辦，就地取材，以免厘稅。其成本較土貨更輕，誠喧賓奪主，以攘我小民之利。我士商若再不猛著先鞭，顧私利而罔遠圖，存妒心而互相傾軋，徒使洋人節節制勝，中國利源不幾盡為所奪耶？（鄭觀應：《盛世危言·商務二》、《盛世危言·商戰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六〇四）

他呼籲本國商人應團結一致，不要短視近利，只圖小利而無遠見，互相排擠攻擊，徒使外人不斷壟斷我國財力物力；相反的，我國應該奪回我們自身的主導權與利益，並設具體的貿易法規，如：只准外人在外阜通商，不准入內地交易與奪取我民之利等。且設立關稅自主，禁止外人源源不絕圖利（注一四）。如此這般，必能達成商戰救國與富我商民，國富民強的目的。

## 參、政出議院

除了「商戰救國」理論外，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更進一步提出學習西方富強之本，其所闡釋的富強之本，總綱就是：「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盛世危言》〈自序〉云：

學西文，涉重洋，日與彼督人交接，察其習尚，訪其政教，考其風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歛，保商務，使物暢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

為文官者必出自任學院；為武官者必出自武學堂。有升遷而無更調，各擅所長，名副其實。與我國取士之法不同。

又：

善夫張靖達公云：「西人立國具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於中華，然其馴致富強，亦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矣。」（八卷本增：誠中地之論也）

且：

年來當道講求洋務，亦嘗造槍炮、設電線、建鐵路、開礦、織布，以起而應之矣。惟所用機器，所聘工師，皆來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通變。德相卑士麥謂我國只知選購船炮，不重藝學，不興商務，尚未知富強之本，非虛言也。

（均見於鄭觀應：《盛世危言·自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二三四）

由此可見鄭觀應所強調的西方富強之本的綱領就是「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前者指西方所設立的議院政治制度，可使君民一體，上下同心，是國家富強的根本；後者所謂「教養」是指作為國家基本政治的關鍵在於教民與養民之策，只有「教養得法」，國富民強才能落實。然如何教養得法？有學者指出四大要點，即：一是興辦學校以培養人才，這是講重視教育、知識與學問；二是改良耕作以盡地利，這是講打好農業這個國家的經濟基礎；三是經營工商以使物暢其流，這是講將作為國家經濟樞紐的工商業宜全面發展起來；四是實現各類官員的專業化與專職化，這是

講保證政府官員都是高素質的管理人才（注一五）。

在此，我們可以發現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光緒二十年（1894）上李鴻章書中的四句名言：「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注一六）實與鄭觀應於光緒十八年（1892）寫的《盛世危言·自序》中所提及的「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暢其流」十分近似。可看出鄭觀應的言論對後來孫中山先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由上述，可知鄭觀應的政治主張是「君民共主」的「立君政治」，所謂：

中國當此危急之時，而求安圖治，上下皆知非自強不可，而自強非變法不可。論者謂變法之易，莫如專制政治，所言不為無見。然蒙謂專制政治，究不如立君政治之公。……立君政治者，即君民共主之國，政出議院，公是非，朝野一致，君民同體，上無暴虐之政，下無篡逆之謀。英、德二國馴致富強，日本變法借材異域，比利時、瑞士列入萬國保護之中，遵斯道耳。（鄭觀應：《盛世危言·自強論》，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三三八）

可看出鄭觀應對變革中國近代社會所開出的藥方，是從當時的實際政治現狀出發；在政治上，鄭觀應主張君民平權的立君政治，即君主立憲政體，且要「政出議院」；所謂「議院者，公議政事之院也。」又公議便是民眾之議，通過議院就能「集眾思，廣眾議，用人行政，一秉致公。」否則便會「君民之間勢多隔闕，志必乖違。」（注一七）其進一步解釋道：

泰西各國咸設議院，每有舉措，詢謀斂同，民以為不便者

不必行，民以為不可者不得強，朝野上下，同德同心。……

合眾志以成城，制治固有本也。……即英國而論，蕞爾三島，……卓然為歐西首國者，豈有他哉？議院興而民智合，民氣強耳。中國戶口不下四萬萬，果能設立議院，聯絡眾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萬萬之眾如一人，雖以併吞四海無難也。（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三一—三一三）

鄭觀應在此分別以泰西各國、英國與中國為例，明確指出政出議院，方能贏得民心，達到君民共主，上下通情（注一八），民主立憲、君民平權的目的。且盛讚英、德的「君民共主」議院制最完善。畢竟議院以民為本，以民為體，集合民眾意見（少數服從多數），方凝聚民眾的意志，上下同心同德，國家才會具有強大力量。然作為議院中的議員，必須由民眾共同選舉出來的民意代表為主。由民意代表議政，才算得上真正的「公議」。關於此，觀應提出：「議院為國人所設，議員即為國人所舉。舉自一人，賢否或有阿私；舉自眾人，賢否難逃公論。」（注一九）且為了杜絕可能存在的爛選爛舉的弊端，保證選出真正的賢者，其規定選舉者必須具有以下條件：「入本籍至十年以後，及年屆三十，並有財產身家、善讀書、負名望」者（注二〇）。然議員選出後，其在議院發表的政論，要接受民眾的監督，所謂：

議員之論刊布無隱，朝議一事，夕登日報，俾眾咸知，論是則交譽之，論非則群毀之。本斯民直道之公，為一國取賢之准……則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誠，伸其抱負。君不至獨任其勞，民不至偏居於逸，君民相洽，情誼交孚。（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上》，夏東元編：

《鄭觀應集》（上），頁三一—三一三）

議員的論述一律開誠布公，公諸於世；早上所議論的事，傍晚就登上報紙版面，讓國人皆知。若論述得有理，意見極好，則得眾人稱譽鼓舞；若論述無理或無利於民之見，則由群眾議論。選賢與能，都是秉持至公至直至平的原則，為國家招募賢才。這樣，議院方能發揮效益，觀應云：

蓋有議院攬庶政之綱領，而後君相、臣民之氣通，上下堂廉之隔去，舉國之心智如一，百端皆有條不紊，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故自有議院，而昏暴之君無所施其虐，跋扈之臣無所擅其權，大小官司無所卸其責，草野小民無所積其怨，故斷不至數代而亡，一朝而滅也。（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三一—二）

鄭觀應倡「政出議院」目的就是「君民共主」，國以民意為要，而不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封建君主專制，如此，才能上合天心，下合民意。這樣，就不會有專制暴君的殘酷作為，臣下等胡亂擅政，乃至大小官司懈怠其職責，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中叫苦連天等情形發生。如此，公是公非，朝野一心，君民同體，便是民主的君主立憲政治，這可謂是鄭觀應的社會改革主張又大舉跨出具體的一大步（注二一）。

## 肆、育人才百事興

鄭觀應在政治上主張君主立憲，建立議院制度，使得君民平權，上下同心，達至民主政治地步。然議員必須民選，必須選賢與能才行，如此，議員賢能，然後議論措施才能有真是非。為達

成「選賢與能」目的，就必須培育人才，為培育人才就要廣開學校、興民智，所以觀應進一步主張：「先設議院，並開學校」之論，強調要開議院，必定要先廣開學校，才行。然此一言論，對後來康有為、梁啟超等變法改革，有深遠的影響（注二二）。觀應亦以為西方富強之本，教養是其中的一重要因素。所以其重視學校教育，視培養人才為「富強救國」的一大方針。其云：

恆覽環球各邦，其國運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才。而人才之盛衰，莫不關乎教化。其教養有道者，勃然以興；教養失道者，忽然以亡。試觀英、德、法、美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遍布國中，……是故人才眾則百事興，舉凡機器、製造、輪船、火車皆巧奪天工，日新月盛，而農政、商務翌日增新法，日為推廣。……此教養有道，而英、德、法、美諸邦勃然隆盛也。（鄭觀應：《盛世危言·教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四八〇）

強調「人才」是系乎國運隆替的關鍵。欲造就人才就必須靠教育，教育有方，則人才輩出則百事興盛；相反的，教育無方，則無人建設，國力日漸衰敗。因此，振興教育，培育人才，亦是觀應「富強救國」的經世之方。所謂：

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國勢所由強，故泰西之強強於學，非強於人也。然則欲與之爭強，非徒在槍炮戰艦也，強在學中國之學，而又學其所學也。（鄭觀應：《盛世危言·西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二七六）

在此所謂「強在學中國之學，而又學其所學也。」學中國之學是

指：格致之學，此格致之學乃是發展科技之學。如此，才能使中國真正富強起來。其云：

蓋世界由弋獵變而為耕牧，耕牧變而為格致，此固世運之遷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顧格致為何？窮天地之化機，闡萬物之元理。以人事補天工，役天工於人事。能明其理，以一人而養千萬人可，以一人而養億兆人亦無不可。我中國生齒四萬萬，人民甲於五大洲，子此元氣，可不亟圖教養之方哉？今日之計，宜廢除八股之科，興格致之學，多設學校，廣植人才，……開誠布公，與民更始。（鄭觀應：《盛世危言·教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四八一—四八二）

興「格致之學」即重視科技發展以振興中國的社會生產力。這乃是時勢所趨，人們宜掌握天地自然之理與運用變化，才是。因此，欲全面提高工商業的發展，就必須教養人民，培育人才。當今之計，宜廢除八股科舉考試，振興科技發展，與廣設學校，教育人才。觀應對傳統科舉考試制度，批評為「汨沒性靈，虛費時日，率天下而入於無用之地。」（注二三）因此，改變科舉現況就是廣設學校，鼓勵人人就學，所謂：「鄉塾散置民國，為貧家子弟而設，由地方官集資經理。無論貴賤男女，自五歲後皆須入學，不入學者罪其父母。」且還要「通過通商院、實學院、技藝院深造，傑出者再入太學院學習。」（注二四）為此，其建議：

中國亟宜參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才，文武並重，仿日本社文部大臣，並分司責任。聘中外專門名家，選譯各國有用之書，編訂蒙學普通專門課本，頒行各省。並通飭疆吏督同地方紳商就地籌款，及慨捐鉅資。相助者報部獎勵。

務使各州、縣遍設小學、中學，各省設高等大學，一體認真，由淺入深，不容躐等。（鄭觀應：《盛世危言·學校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二六七）

廣設學校外，更要全面改變教學內容，以改變人們的知識結構與既有觀念。觀應欲將「西學」普遍傳入中國，則將西學內容分天、地、人三類。所謂天學，「以天為綱，而一切算法、曆法、電學、光學諸藝，皆由天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地學，「以地輿為綱，而一切測量、經緯、種植、車舟、兵陣諸藝，皆由地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人學，「以方言文字為綱，而一切政教、刑法、製造、商賈、工技諸藝，皆由人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注二五）如此，可見皆是有益於國計民生之學，實用且具實效。在此，觀應進一步指出：

論泰西之學，派別條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農、漁、牧、礦諸務，無一不精，而皆導其源於汽學、光學、化學、電學。以操御水、御火、御風、御電之權衡，故能鑿渾沌之窮，而奪造化之功。

又：

西法各種，西人藉以富強，已收實效，皆有程式。我步趨其後，較易見功。由西文譯作中文，以西學化為中學，不及十年，中國人才無難與泰西相頡頏。（鄭觀應：《西學》、《考試下》，《盛世危言》，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二七四、二〇一）

實用性強的學科，均是以基礎性的學問為根基。且「皆實徵諸事，非虛測其理」（注二六）。講究實驗與實證，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十分證據則說十分話，這便是自然科學，理工科技實證的

特色。此外，除廣設學校之外，觀應還主張宜大力發展社會教育，所謂：「大抵泰西各國教育人才之道計有三事：曰學校、曰新聞報館、曰書籍館。」（注二七）就是宜興辦各種報章雜誌，出版各類書籍，並廣為建立報社與圖書館。畢竟通過報紙，可使人們在家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各地設有圖書館，「無論寒儒博士，領憑入院，即可遍讀群書。」（注二八）如此，各地皆是有知識水平的人，文盲等便會減少，以此便可根本改變統治者一以貫之愚民、防民的思想。觀應認為只要「人之靈明日啟，智慧日積」便能「人才濟濟，國勢日強。」（注二九）然惟有使國家人才眾多，方能提升一國之強勢與君民的關係。

## 伍、結語

「開千古未有之奇變」可謂是中國近代史上人們對自一八四〇年英國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以來，社會性質發生劇變的描繪（注三〇）。從全局來看，「變」實際上有兩方面：一是向壞的發展，就是一個獨立的封建社會變為資本帝國主義共同統治的半殖民地；另一是向好的方面發展，就是中國人民及其先進代表人物與有志之士，要把中國從落後變為先進、貧弱變為富強（注三一）。要如何達到登中國於先進富強之境？這是當時許多有志之士思考與努力的問題。在鄭觀應之前，龔自珍（1792-1841）即以今文經學的歷史觀提出變法改革之要；林則徐（1785-1850）、魏源（1794-1857）等強調「師夷長技以制夷」；郭嵩焘毅然指出中國欲富強，當仿西法之政教；張之洞則（1837-1909）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種種，都是當時力圖救亡圖強的理論；然鄭觀應則是從經濟、政治與加速新式人才培育全



方位的「變」的方式，與外人「商戰」，致力達到「富強救國」經世濟民之目的者。其云：

有國者苟欲攘外，亟需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自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頁一一）

要使國家有力量抵抗外侮侵略，就要自立自強，然要自立自強必先致富，但要致富絕對不是關起門來獨自經營，而是要引進與學習西方先進科技與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並與之相應的是改良政治，即變封建專制為民主立憲制，還有最重要的是大力培育科技專業人才與管理人才，才是。所謂「商戰救國」，從根本上說，就是人才之戰，不僅僅需要商業人才，士、農、工、商各行各業都應當為「商戰」盡力（注三二）。

綜合言之，鄭觀應《盛世危言》經世思想主要是：培育人才、君主立憲（政出議院）與振興工商。因人才足則萬事俱舉，振興工商則國力富強，富而後能強，故習兵戰不如習商戰，習形戰不如習心戰，也就是他認為若要與外人競爭高下，則需先求「學戰」（注三三），才能求商戰，再其次求兵戰。然不論商戰與教育，或仿西法以振興實業，都要經過上位者的政策與法令施行，所以在政治上，觀應主「政出議院」，由人民作主，民選議員代表來決定政事，這樣，方能「使輿論見諸事實，得遂萬民之望。」（注三四）

總之，晚清思想家鄭觀應的名著《盛世危言》，圍繞著其「商戰」思想，結集一百多篇時務專論，從政治到經濟，從政策到法律，從文化到教育，從國際到國內，從現狀分析到變法主張，幾

乎涵蓋當時中國社會所面對的所有重大問題，此書為當時人與後人譽為「變法大綱」（注三五）。甚有學者指出：鄭觀應是當時全方位「變」的有志之士的佼佼者（注三六）。然不論如何，鄭觀應當時所提出許多策略與改革方針，確實影響到後來許多有志之士維新、變法與改革，對中國近代邁向現代發展有莫大助益。（作者為陸軍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國文副教授）

#### 注釋

注一：孫會文等著：《中國歷代思想家——曾國藩、郭嵩濤、王韜、薛福成、鄭觀應、胡禮垣》（十八）：「道光二十年（1840）的鴉片戰火，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九年），頁二六七。另戴逸：《總序》：「現在國內學界比較一致的認識，是把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視為中國的近代。」任智勇等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鄭觀應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四年），頁一。

注二：陳君聰：《現代化先鋒——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臺北市：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九年），頁九九。另在陳志良：《編序》亦云：「鄭觀應既是中國近代最早倡導民主與科學的啟蒙思想家，又是一位由買辦轉化過來的，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民族資本家」，陳志良選注：《盛世危言》，（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二。

注三：彭玉麟〈序〉，鄭觀應《盛世危言》，鄒振環整理《危言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三年），頁七。

注四：鄭觀應：《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轉引自夏東元：《鄭觀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五—七。

注五：鄭觀應：〈秉商條陳六弊請通飭各總商會舉調堂員互相砥礪事〉，《盛世危言後編》卷八，夏東元：《鄭觀應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六〇四。

注六：整理自趙天儀編撰：〈鄭觀應小傳〉、鄒振環：〈《危言三種》導讀〉、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前者依序是趙天儀等編著：《中國前途的探索者——現代中國思想家》（第二輯），（巨人出版社，一九七八年），頁一六三—一六四；鄒振環整理《危言三種》，頁四—六。

注七：鄒振環：〈《危言三種》導讀〉，鄒振環整理《危言三種》，頁六。

注八：鄒振環：〈《危言三種》導讀〉，鄒振環整理《危言三種》，頁六。

注九：陳君聰：《現代化先鋒——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頁一〇一；另孫會文：〈鄭觀應的著作〉中提及：「最足以代表鄭觀應一生事功和思想的著作；這一類的著作，約有下列數種：《救時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後編》、《海行日記》與《南遊日記》。……

《盛世危言》代表鄭觀應的思想，《盛世危言後編》則是代表鄭觀應一生的事功。」孫會文等著：《中國歷代思想家——曾國藩、郭嵩濤、王韜、薛福成、鄭觀應、胡禮垣》（十八），頁二六三。

注一〇：見鄭觀應：《盛世危言》，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頁二二五—九四〇。

注一一：陳志良：〈編序〉，陳志良選注：《盛世危言》，頁四。

注一二：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五〇五。

注一三：鄭觀應：《盛世危言·商務二》、《盛世危言·商戰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六〇五。

注一四：關於這方面，鄭觀應主張：「貿易之法，……如日本重訂稅則，振興商務，仿西法，只准各國在外阜通商，不准入內地奪我民之利，何慮人心不服？」又「為今之計，不如裁撤厘金，加增關稅，其販運別口者仍納半稅，貨洋一律徵收。則洋人無所藉口，貨商不至向隅，似亦收回利權之要道也。」分別見《盛世危言·傳教》、《盛世危言·稅則》，《鄭觀應集》（上），頁四〇九、五四四。

注一五：宋德華：〈論鄭觀應學習西方富強之本的思想——以《盛世危言》為中心〉，《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一〇卷第二期，二〇一一年二月，頁八一。

注一六：孫中山：〈上李鴻章陳救國大計書〉，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四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頁三。

注一七：均見於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三一。

注一八：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上》云：「欲強國勢，莫要於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於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於設議院。」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三一四。

注一九：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三一三。

注二〇：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三一三。

注二一：齊國華：〈論《盛世危言》的立言與社會實踐〉云：「他所肯定的君民共主議院政制，實踐上就是西方的君主立憲制，……這當是一種歷史上的進步。」《史林》一九九〇年二月，頁一九。

注二二：孫會文：〈鄭觀應對西方議會制度和君主立憲政體的認識和態度〉，孫會文等著：《中國歷代思想家——曾國藩、郭嵩濤、王韜、薛福成、鄭觀應、胡禮垣》（十八），頁二八三。

注二三：鄭觀應：《盛世危言·西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二七六。

注二四：鄭觀應：《盛世危言·學校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二四六。

注二五：鄭觀應：《盛世危言·西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二七二—二七三。

注二六：鄭觀應：《盛世危言·西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上），頁二七五。

注二七：鄭觀應：《盛世危言·學校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二四七。

注二八：鄭觀應：《盛世危言·藏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三〇六。

注二九：鄭觀應：《盛世危言·教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頁四八〇。

注三〇：夏東元：〈鄭觀應「富強救國」思想簡論〉，《歷史教學問題》二〇〇六年第三期，頁四九。

注三一：夏東元：〈鄭觀應「富強救國」思想簡論〉，《歷史教學問題》二〇〇六年第三期，頁四九。

注三二：姜義華：〈鄭觀應與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發端〉，《嶺南文史》二〇〇二年第三期，頁二九。

注三三：范振乾：《鄭觀應的改革理論（1860-1911）》中指出：「『形戰』即槍礮兵艦之屬。『心戰』即『士有格致之學、工有製造之學、農有種植之學、商有商務之學。無事不學，無人不學』（見鄭觀應：新編（二），頁七六三—七六四），故心戰亦即學戰。」（臺北：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七七年），頁二七二。

注三四：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頁四一六。

注三五：王五一：〈變法大綱中的債務戰略——《盛世危言》「國債」篇探析〉，《社會科學》二〇一九年第七期，頁一五六。

注三六：夏東元：〈鄭觀應「富強救國」思想簡論〉，頁四九。